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成果

東亞筆談文獻資料叢刊

日本藏

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

大河內文書

(第一冊)

王寶平 主編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東亞筆談文獻整理與研究”成果

東亞筆談文獻資料叢刊

日本藏

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

大河內文書

(第一冊)

王寶平 主編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近代中日筆談文獻之瑰寶

——《大河內文書》前言

王寶平

時光倒轉，穿越百年。

1884年春，江戶幕府儒官林羅山第12代哲嗣林學齋為清政府駐日外交官黃吟梅舉行家宴，日僧高岡殷勤作陪。屋內半晌不見動靜，僕人深感詫異，走近一看，驚訝地發現：三人宛如啞人，時而以手摹畫，時而相視而笑，不停地在紙上塗寫。於是奔走相告：文昌帝君的侍童——天聾和地啞降臨老爺家了！¹

無獨有偶，相似的一幕也出現在著名漢學家岡千仞府邸。晚清駐日使節沈文煒應邀做客，兩人觥籌交錯，以筆代語，一語不發。一旁殷勤服侍的岡妻不由地嗔怪：你倆一聲不吭，表情和手勢酷似啞巴。何苦作“啞飲”來著？！²

這兩則軼事發生在130多年前，均是由筆談引發的“誤會”。所謂“筆談”，《漢語大詞典》有一精準的界定：謂書面談話。亦即通過書寫進行交談。明治時期，日本人不曾說漢語，但擅長書寫，而中國人不諳日語，於是往往以筆代舌，開展交流。筆談與唱和、序跋、書信一起，成為當時中日文人間盛行的交流方式³。本文介紹的《大河內文書》，就是明治時期筆談文獻中的犖犖大者。

1 實藤惠秀編譯《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東京：平凡社，1964年，第11頁。又，傳說文昌帝君掌管文章科舉，關係富貴貧賤。天聾、地啞是其侍童，一個掌管文人錄運簿冊，一個手持文昌大印，意為能知者不能言，能言者不能知，以免天機泄漏。

2 岡千仞《芝山一笑》後序，東京：文昇堂，1878年。參見拙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中日詩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4頁。

3 參見拙稿《清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視角（代前言）》，《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一、何謂《大河内文書》

顧名思義，《大河内文書》原指有關大河内姓氏家的文書。但治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者，多指大河内輝聲保存的筆談資料，她是大河内輝聲等日本友人與在日中國人和朝鮮半島人士之間的交流記錄。在現存林林總總的筆談記錄中，《大河内文書》以其持續時間之長、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參加人數之衆，名列近代筆談資料之首。

《大河内文書》總計約95卷，缺17卷，現存8種78卷76冊，庋藏于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51卷50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6卷16冊，高崎市賴政神社6卷6冊，以及實藤惠秀抄本5卷4冊（參見附錄一《大河内文書》佚存一覽表）。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和賴政神社藏本冊子裝，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子裝；冊子裝藏本書根寫有書名（見下頁書影）。筆談資料多以筆談者（《羅源帖》等）和筆談時間（《丁丑筆話》等）命名。具體情況如下：

1.《羅源帖》：1875年（光緒元年，明治八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大河内輝聲等與中國寓日民間文人羅雪谷的筆談記錄。現存16卷16冊，缺第一卷和第十五卷，前者當為近1875年9月3日前的筆談，後者應在1876年5月19日至6月19日之間。據第十八卷內容推測，不排除此後尚有逸稿。

2.《丁丑筆話》：1877年（丁丑，光緒三年，明治十年）7月7日至同年12月31日的筆談記錄。筆談人物主要為大河内輝聲、王氏三兄弟（王泰園、王琴仙、王惕齋）等中日友人，凡7卷6.5冊（《丁丑筆話》七與《戊寅筆話》一合為1冊）。

3.《戊寅筆話》：1878年（戊寅，光緒四年，明治十一年）1月2日至同年12月15日的筆談記錄。中方參加者有何如璋、黃遵憲等公使館人員以及王氏三兄弟、馮雪卿等寓日民間文人，日方除大河内輝聲外，尚有石川鴻齋、龜谷省軒、增田岳陽、青山延壽、加藤櫻老、森春濤等著名漢學家。該筆話現存25卷24.5冊，其中第六卷、第十五卷和第二十四卷已逸，前兩卷僅存實藤抄本；逸失的第二十四卷，筆談時間當在前後兩卷之間（10月28日至11月14日）。由於第二十六卷終於12月15日，此後或有逸稿。

4.《己卯筆話》：1879年（己卯，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筆談記錄。原有16卷，現僅存第十五、十六兩卷，1.5冊（《己卯筆話》十六與《庚辰筆話》一合為1冊），1879年12月12日至12月31日大河内輝聲、龜谷省軒、石川鴻齋與公使館人員、寓日民間文人之間的交流記錄。缺第一卷至第十四卷，時間當在1879年元月至12月12日（第十五卷）之間。又，第十六卷原件已逸，現存實藤抄本。



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藏《戊寅筆話》（部分）封面



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藏《戊寅筆話》（部分）書根



賴政神社藏《丁丑筆話》六卷函盒及書根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大河内文書》十六卷

5.《庚辰筆話》：1880年（庚辰，光緒六年，明治十三年）1月1日至5月26日的筆談記錄，參加人員有大河内輝聲、龜谷省軒、石川鴻齋、駐日公使館人員、寓日民間文人等。現存第一至第九卷，8.5冊，其中第1卷原件已逸，現存實藤抄本。1880年5月26日之後，大河内輝聲依然為公使館的常客，而第六種《泰園筆話》未見何如璋等外交官的筆談記錄，因此第九卷之後或有散逸。

6.《泰園筆話》：1880年（光緒六年，明治十三年）5月10日至1881年10月13日中日民間交流記錄，中方主要有王治本等寓日文人，日方主要有大河内輝聲等日本友人。凡17卷17冊，足本。

7.《韓人筆話》：1卷1冊，1880年（光緒六年、明治十三年）8月27日至9月6日大河内輝聲、龜谷省軒、王治本與朝鮮修信使金宏集等人的交流記錄。是年朝鮮派遣禮曹參議金宏集為修信使出使日本，與日方交涉外交懸案。此行修信使帶回黃遵憲的《朝鮮策略》，最終促使朝鮮決策者改變對外政策，與美簽約。

8.《書畫筆話》：1卷1冊，分書畫筵、茶醺、贈友、贈美、課題、偶吟等，多為王治本為大河内輝聲修改的詩作。審其內容似不應歸入筆談，大河内輝聲本人亦將之單獨設卷，但鑒於封面卷名有“筆話”二字，且詩文交流亦為筆談的一項重要內容，姑且予以保留。藉此亦可窺見詩文交流的原始狀態。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大河内文書》的紙背亦傳遞著不可忽視的資訊：或貼有明信片，或書有文字，如本書第四冊第1774（明信片，以下稱“明”，未注者為文字）、1799、1801、2026（明）頁；第五冊第2100（明）、2123（明）、2166（明）、2168（明）、2369（明）、2467（明）頁；第六冊第2733、2749（明）、2811（明）頁；第七冊第3148、3153、3175、3190、3196、3198、3204、3231（明）、3294、3310、3397（明）、3402、3444頁等。明信片有12通，紙背文字14處。

大河内輝聲生前已對筆談作了精心的整理，如在每次筆談的卷首（《羅源帖》除外）用朱筆標有序號，對此我們在本書附錄二細目中予以保留。據此可知，《丁丑筆話》共進行89回筆談（含書信，下同），缺第一、第二、第七之下，共3回筆談；《戊寅筆話》凡178回，缺第六至第九、第六十一至第六十六，凡10回筆談；《己卯筆話》共有93回筆談，缺第一至第十四卷84回；而《庚辰筆話》現存九卷本70回筆談毫無缺失；《泰園筆話》第八卷9月11日第八十三回筆談（第3119頁）與9月10日第八十二回筆談（第3123頁）錯簡¹。遺憾的是，未知何故，序號的標識工作至《泰園筆話》第十三卷3月30日第一百六十回（第3381頁）戛然而止，我們失去了判斷4月1日至10月13日80回的筆談是否足本的重要依據。

1 此外，《泰園筆話》第九卷9月24日筆談（第3173頁）應移至9月25日（第3171頁）前。

據此，我們可以對《大河內文書》的文獻做進一步的界定：《羅源帖》存16卷16冊，缺第一卷和第十五卷，第十八卷後或有逸稿；《丁丑筆話》存7卷6.5冊，卷帙完整，但缺3回；《戊寅筆話》現存25卷24.5冊，除第二十四卷6回筆談外，尚缺4回，第二十六卷後或有逸卷；《己卯筆話》存2卷1.5冊，缺第一卷至第十四卷凡84次筆談；《庚辰筆話》存9卷8.5冊，第九卷後或有逸卷；《黍園筆話》17卷17冊，足本；《韓人筆話》1卷1冊，足本；《書畫筆話》1卷1冊，足本。

大河內輝聲對筆談的精心整理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注明筆談者。在筆談者較多的情況下，大河內輝聲常在句末用較小字型的名字省稱寫明筆談者。如“黍”（王黍園）、“琴”（王琴仙）、“惕”（王惕齋）、“哲”（秦哲明）、“梅”（沈梅史）、“如”（何如璋）、“樞”（廖樞仙）、“公”（黃公度）、“斯”（張斯桂）等，不一而足。

其次，注明筆談時間。人數不多無需注明筆談者，僅在每次交流後寫明筆談的時間，如《羅源帖》“係乙亥第九月三日之談話也”（第16頁）、“係乙亥第九月四夜之談話也”（第50頁）、“係乙亥第九月初五日朝之談話”（第74頁）、“係乙亥第九月五之談話也”（第77頁）等。但《羅源帖》以外的6種資料，則在筆談首頁朱筆注明筆談的時間或信件往來的時間。

最後，注明筆談情景。大河內輝聲多在卷首或卷中用朱筆加入一些提示，這些提示，或長或短，詳略不一，補充說明筆談時的情景。如戊寅3月3日（光緒四年一月三十日，1878年3月3日），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率領沈文燮等外交官首次做客大河內輝聲家。大河內在筆談前如此介紹：

此日午後（戊寅三月三日也）四時、公使何如璋、沈梅史、○何氏僕、通辦官魏梨門来る。○此日櫻屋の料理の外、蝦、玉子、鶏の馳走。藝者小鐵と酌福助ヲ聘す。松井強哉ヲ陪セしむ。何氏の僕は女部屋にて食事。（第1383頁）

漢譯：此日午後（戊寅三月三日也）四時，公使何如璋、沈梅史及何氏僕人、通辦官魏梨門來。此日除櫻屋料理外，尚品嘗蝦、雞蛋、雞等佳餚。招藝妓小鐵和陪酒福助，令松井強哉陪席。何氏僕人去女傭房間用膳。

現存筆談文獻中，其保存形態概而言之有三種：一，散葉。原封不動地保留著筆談時的初始狀態，有時寫在傳統的花箋上。多走筆疾書，書主不明，次序不清。二，整理本。對原始記錄進行了整理的文本，如宮島誠一郎對大量的筆談記錄做了重新抄錄¹。它克服了散葉之不足，却需今人謹慎面對整理後新產生的異文。三，半整理本。在保留原文的基礎上，對筆談時間、地點、順序，甚至背景進行提示，《大河內文書》即是。這些提示，猶如脚本中的舞臺說明，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二、《大河內文書》的發現者——實藤惠秀

實藤惠秀（1896—1985），廣島人，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中國文學專業畢業，1949年起擔任早稻田大學教授，1967年榮退。他以研究中國人日本留學史起家，1939年出版《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日華學會），後推出修訂本《中國人日本留學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同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該著中譯本《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問世後，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深受好評。

實藤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上也有頗多建樹。“二戰”中，學術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實藤潛心於《大河內文書》的整理，戰後分別將《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平凡社，1964）和《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付梓。他還出版《中譯日文書目錄》（國際文化振興會，1945）和《日本譯中國書目錄：日中友好の一つの礎石として》（與小川博合編，日本學生放送協會，1956），並在此基礎上，監修出版《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譚汝謙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同上，1981），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此外，1933年，實藤作為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華特別研究員來華研究。在這一年中，收集了許多東遊日記等清末民國時期的珍貴文獻，它們現在全部收藏在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成為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資料寶庫。

實藤主要研究近代中日關係、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學，前者的成果還有：《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響》（螢雪書院，1940）、《近代日支文化論》（大東出版社，1941）、《明治日支文化交渉》（光風館，1943）、《アジアの心》（與實藤遠合著，淡路書房，1956）、《日中非友好の歴史》（朝日新聞社，1973）、《中國留學生史談》（第一書房，1981），以及《日中友好百花》（1985）。著述豐富，為近代中

1 參見拙文《日藏黎庶昌與宮島誠一郎筆談記錄》，《文獻》2014年第6期。

日文化關係研究的主要開拓者¹。

1943年11月14日，在大河内輝聲哲嗣大河内輝耕的斡旋下，實藤偕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合譯者豐田穰²前往平林寺調查中日筆談資料。該寺位於埼玉縣新座市野火止，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也是大河内家的菩提寺（家廟）。當住持白水敬山³打開保存資料的庫房時，他倆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原以為僅有五六頁散葉的資料，不意竟達數十冊之巨，並且裝裱如此完整！從此，《大河内文書》揮去蒙垢半個世紀之久的封塵，重現天日⁴。實藤根據藏主姓名，命之為“大河内文書”。

筆談資料深藏於遠離市井的平林寺，固然無遺失之虞，無奈庫房下流淌著來自多摩川的居民用水——玉川上水，濕氣嚴重，以致筆談資料即使夾有煙葉，仍不敵紙魚的侵蝕。白水住持介紹：前幾年已處理了部分蟲蛀嚴重的資料。大河内去世後，著名漢學家龜谷省軒為其撰寫墓志銘，其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于家”⁵一語。實藤據此推測：完整的筆談資料或有百冊，不排除在《羅源帖》《戊寅筆話》和《庚辰筆話》之後，尚有佚卷⁶。

三、《大河内文書》主人——大河内輝聲

大河内輝聲（1848—1882），初作輝照，後改輝聲，字子斌，江戶（今東京）人，嘉永元年（1848）十月望日（十五）生，故號桂閣。祖先乃江戶時代前期著名的大名松平信綱（1596—1662），生於大河内久綱家，過繼給松平正綱做養子，易姓松平。慶應四年（1868），松平哲嗣恢復舊姓，輝聲始稱大河内。由於大

1 實藤惠秀的介紹部分參考《實藤惠秀先生略歷附著述》，《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學術研究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篇》1967年；六角恒廣《ああ 實藤惠秀先生》，《中國研究月報》442號，1984年12月。

2 豐田穰（1912—1946），學術代表作有《日本雜事詩》（黃遵憲著，實藤惠秀、豐田穰譯，生活社，1943年）、《唐詩選評釋》（森槐南著，豐田穰補註，富山房，1938—1939年）、《唐詩研究》（豐田穰著，養德社，1948年）。

3 白水敬山（1897—1975），平林寺住持，著有《牧牛窟閑話》（1974年）、《自屎錄》（1974年）、《敬山錄》（1981年）等。

4 鄭子瑜認為“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的筆談遺稿，先是由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鈴木由次郎先生發現於平林寺”（《懷念實藤惠秀先生》，鄭子瑜《挑燈集——鄭子瑜散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29頁），此似有誤。鈴木由次郎在平林寺發現的是黃遵憲《日本雜事詩》詩家。見實藤惠秀《大河内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そえがき一，第229頁。

5 《大河内桂閣君墓銘》，《省軒文稿》卷二，榊原文盛堂，1902年，第19頁。

6 實藤惠秀《大河内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第235頁。

河内家源於攝津（今屬大阪府和兵庫縣）源氏源顯綱（鎌倉時代後期公卿），而源顯綱為平安末期著名武將源賴政之文孫，故輝聲除大河内外，又時稱源氏。

大河内輝聲的父親輝聽早逝，他13歲就繼承了八萬二千石領地的家業，成為上野高崎藩（今群馬縣高崎市）最年輕的藩主。文久二年（1862）任從五位下右京亮（右京職次官），慶應二年（1866），聘請法國教練，帶兵苦練西式軍事。翌年，擔任陸軍奉行，負責幕府的步兵、騎兵和炮兵。

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1867年11月9日），江戸時代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面對西學東侵無力應對，被迫宣布向天皇“大政奉還”。從此，大河内輝聲的命運開始多舛。明治二年（1869），“版籍奉還”，他被任命為高崎藩知事，貴為華族。明治四年（1871）五月，進入大學南校（東京大學前身），研習英語。未幾（七月），政府宣布“廢藩置縣”，大河内被免去知事，成為高崎藩末代藩主¹。被褫奪權力後，他在東京過起寓公生活。明治十四年（1881）七月，大河内任職修史館，王治本、王仁爵（第3494頁）以及葉慶頤（第3496頁）致函祝賀。在修史館任上，他曾吟詩《史館夜翻古書，與僚屬校讐即作，伏乞郢政。仍用史館僚屬鈴木成章韻》一首（第3711頁），詩曰：

檢點雲篇燦燭花，此書原是屬官家。
半殘半闕遺三篋，且閱且披滿五車。
玉軸頻陳香木架，縹囊高曝竹竿叉。
蘭臺日落吟情倦，聊撥紅爐烹澗茶。

栩栩如生地傳達了在修史館夜翻古書的氣氛。明治十五年（1882）8月15日，患哮喘病夭折，享年35歲。

大河内輝聲是中國文化的鐵桿“粉絲”。祖上輝和（1750—1800）號聽雪，祖父輝充（1822—1862）善書法，父親輝聽（1827—1860）號樂甫，從他們的號和愛好中，可以窺見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之一面。生活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的大河内，耳染目濡，浸染不淺。高崎藩非常重視教育，除在高崎設有“遊藝館”外，還在江戸添設“育英館”，兩所學校聘請著名學人任教，其中有江戸末期漢學家長谷川域（1816—1868）。長

¹ 據明治四年統計，高崎藩有士族429戶、1923人，卒601戶、1992人，市民2357戶、8729人，屬於小藩。參見深井景員《大河内輝聲侯略歷》，上毛郷土史研究會《上毛及上毛人》第32號，1919年7月。

谷川，字子肇，號昆溪，別號醒翁、寒香園，遺有《昆溪百律》和《寒香園詩文鈔》。據研究，大河內輝聲的漢詩深受其影響。¹

或因如此，大河內輝聲對中國文化充滿敬仰之情，與中國人吟詩筆談，樂此不疲。首屆公使何如璋駐日後，大河內輝聲是較早主動拜訪的日本友人之一。他“陶然心醉，於是來往無虛日，談笑戲謔，以至彼我相忘”。他經常赴使館筆談，“終日不知倦，紙疊作丘，奇論成篇”²。大河內曾這樣直白地比較中西文化：

慶應年間，余結交於西洋人，講習其藝術，窺其所爲，無事不窮其精妙者，大喜其學之窮物理，以能開人智。明治初，余解組掛冠，占棲墨江。自是後，以無用于世，乃改轍結交清人。相識日深，情誼月厚，而其交遊之妙，勝於西洋人遠矣。蓋西洋人神氣穎敏，行事活潑，孜孜汲汲，覃思於百工器用製造也。至清國人，則不然，百官有司，廟謨之暇，皆以詩賦文章，行樂雅會，善養精神，故性不甚急也。

在比較中西文化之差異後，他得出結論：“京畿之商賈、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趨利輩，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棲，詩酒自娛之人，宜交清國人也。”³

景仰中國文化、有錢、有閒，這些缺一不可的要素催生了百卷之巨《大河內文書》的誕生。

而今冢木已拱，但墓碑依然高聳於平林寺。久久摩挲漢學者老撰寫的墓志銘⁴，再次細細品味其公允的評價：

君天資敏捷，善文辭，工筆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于家。諸藩主之罷官，會東京也，大率娛狗馬，耽麴蘖，與歌妓優伶相狎。君獨潛心書史，下賢禮士。會清國公使何子戡來駐節，君昕夕過

1 上述大河內輝聲的介紹主要參考實藤惠秀《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卷首，以及深井景員《大河內輝聲侯略歷》。

2 源（大河內）輝聲《芝山一笑》後序，東京：文昇堂，1878年。拙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中日詩文交流集》，第61頁。

3 源（大河內）輝聲《芝山一笑》後序。拙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中日詩文交流集》，第61、62頁。

4 《大河內桂閣君墓銘》，《省軒文稿》卷二，第19頁。明治十七年七月龜谷行（省軒）撰文，成瀨溫（大域）書，太政大臣從一位大勳位公爵三條實美篆額。又，成瀨溫參加《大河內文書》筆談（第1808頁等），後爲何如璋和黃遵憲題楣“人境廬”。

從，又延其國儒生王漆園爲館客。如副使張魯生、參贊黃公度兄弟，及沈梅史、廖樞仙，皆博雅秀達之士也，君與之酬唱、文字之飲，幾無虛日。而余幸得從其後，周旋筆硯間，誠一時之盛也。（下略）

可謂擲地有聲，蓋棺而定。

四、《大河內文書》的筆談場所

由於筆談時間較長，《大河內文書》的筆談場所亦多達數十處。爲敘述方便，析爲以下5處：

第一，私宅。以大河內輝聲寓所占多數，尤其《羅源帖》16卷和《泰園筆話》17卷，幾乎均是如此。大河內寓所位於淺草今戶町十三番地（今隅田公園內），臨河而建，橫穿市區東部的墨川盡收眼簾，白鷗飛來，舟船遠去，對岸的向島更是花紅似火，乃聞名遐邇的賞櫻勝地。在這座名爲桂林莊的寓所，中國友人經常成爲座上賓。由此她也因清季文人的妙筆而生動起來：

輝聲，號桂閣，爲日本世襲諸侯，封地在西京高崎。今主新政，概廢藩封，令各諸侯俱遷往東京，所有采地全行歸公，視其地之大小，歲給俸金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如願出仕亦可。桂閣年僅三十餘，澹泊不仕，以詩文自娛。所住之屋臨水，名曰墨江。對岸櫻花十里，春日景致極佳。室中皆名人字畫，照中國式，設有桌椅、茗碗、尊彝，位置優雅。¹

另一文人如是介紹大河內的書齋：

天然圖書樓 樓爲襲侯源桂閣別墅中之度藏圖書好玩處也。凡五楹，在墨沱江西濱之今戶町，頗占江山風月之勝。按，桂閣，名聲輝，源氏，爲東國世勳食邑大河內，自納土歸藩，僑居京邸，結構亭榭，以吟咏翰墨自娛。尤酷愛華人書畫，故樓中所藏，於我國初以來諸大家法繪名書，莫不羅而致之。²

而王韜的筆端則流淌著墨川煙花大會的寶貴記錄：

1 李筱圃《日本紀遊》光緒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條，《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1985年，第174頁。

2 葉慶頤《策鰲雜摭》卷七，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本，1980年，第10頁。

六月朔日午後，應大河內源桂閣之邀，往觀煙火。高樓數椽，俱臨河濱，憑欄一望，墨江如帶，而環河數百家，無不歷歷在目。一至黃昏，燈火遠近可數，誠大觀也。相距數十武爲新樓，尤軒爽。¹

除此以外，筆談還在漢學家家中舉行，龜谷省軒、森春濤、神波即山、關根癡堂、成瀬大域等府邸都曾作爲交流場所。有時也在舊藩主家交流，如佐倉藩藩主紀鹿洲、津藩藩主藤堂詢堯和勝山藩藩主小笠原化堂。此外，也有數次在曾根俊虎和町田久成家中舉行，前者時任海軍少尉，後者歷任內務省博物局長、首任帝國博物館館長等。

除日本人府邸外，筆談也移至客寓扶桑的中國民間文人住所進行。其中周幼梅處最多，達9次，其他有馮雪卿、衛鑄生等。周幼梅，蘇州人，首任東京外國語學校（今東京外國語大學）漢語學科教師，後客居日本以繪畫爲生，終老他鄉。

第二，料理店。上野和向島是東京最著名的賞櫻名勝地，店家林立，聚會便利，因此成爲筆談的首選之地。其中植半樓最多，凡17次。該店又名千秋樓，坐落於向島景區，專營日本料理，院後擁有優雅的日式庭院，爲近代文人墨客經常聚會之地²。此外，上野的長酩亭、真松亭、無極庵、酣春樓等料理店亦曾作爲中日交流的場所。

除上野和向島外，新橋的賣茶屋、芝的長門屋和福住樓、日本橋的福井樓、湯島的魚十樓，皆爲中日文人交流時經常光顧的料理店。

可以想見，僻靜之處，中日二三摯友鋪紙研墨，揮毫不輟。窗外是鳥語花香，屋內是“啞語”進行時。談至會心處，微笑寫在臉上，肚子出現小饑，就地解決，料理店的筆談，一如今天中國的茶樓。“幸虧文字同，筆硯結友鄰。花前靜默座，未見嘴唇動。伺童驚相告，天聾地啞到俺家。”³這首詩道出了日本普通民衆眼中筆談交流的情形。

第三，公使館。在中方的筆談場所中，以駐日公使館居多，達80餘次。何如璋赴日後，使館最初設在芝的月界院。該院爲增上寺子院，此前曾用於海軍家屬樓。首屆外交官在此辦公10個月，何如璋以此爲據點

1 王韜《扶桑遊記》光緒五年（1879）六月朔日條，《走向世界叢書》，第473頁。

2 實藤惠秀《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第30—31頁。

3 實藤惠秀《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第11頁。

與明治政府交涉球案，現為勞動委員會會館。後因月界院空間逼狹，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一日（1878年10月16日）履行購置手續後，使館移硯麴町區（今千田區）永田町二丁目二番地。此地原是華族會館，面積合一萬多平方米（3332坪），現已易為衆議院第一議員會館和總理大臣官邸。因此，以1878年10月為界，在公使館舉行的筆談包括新舊兩館。而在公使館舉行的首次筆談是在1877年2月25日。明治時期日本導遊書中曾刊登其正門照片，并有這樣的描述：“高閣宏檀，讓人遙想咸陽宮。寓居館內的中國人，多為顯官，服飾極美，童女嬉戲，豐頰綠鬢，可愛之至。”¹

第四，王氏兄弟處。許多筆談也選在凌雲閣（13次）、履祥號（29次）和聞香社（10次）進行。凌雲閣和履祥號均為王惕齋經營的雜貨店，前者位於淺草黑船町，後者在外國人定居點築地的入舟町（一作“入船町”），明治十一年（1878）開業²。聞香社為王治本（1835—1908）在“上野池の端”開辦，每月2次傳授詩文和漢語，學員中有森春濤、永阪石埭、林櫟窓等人³。王治本號泰園，亦作漆園，浙江慈溪人。明治十年（光緒三年，1877）赴日，先後任日清社、同人社漢語教師，中國駐日公使館學習翻譯生。長達17卷的《泰園筆話》主要為他與大河內輝聲等人的筆談資料⁴。從筆談場所亦可證明，王惕齋和王治本的居處成為中日民間交流的據點，他們為中日交流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五，其他。如天德寺、大養寺、淨名院和龜戶菅公廟（天神社）等寺廟，伊東屋、山田屋等旅館，日清社等漢語學校，以及墨江畔、堀切村、皇園（明治神宮御苑）等景區。大河內還專程訪問橫濱領事館，在橫濱關帝廟、會芳樓和均昌號等留下筆談記錄。

《大河內文書》第七種為《韓人筆話》。十天（1880年8月27日至9月6日）的交流均在東本願寺和宗重正府邸舉行。前者自江戶時代1711年起就成為朝鮮官方代表團的下榻之地，後者宗重正（1847—1902）乃江戶末期對馬國（今長崎縣對馬市）府中藩的第15代藩主，明治維新廢藩後擔任外務大丞，負責對朝外交。

1 瀨川光行編《日本之名勝》，東京：史傳編纂所，1900年。

2 關於王惕齋可參見拙文《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齋之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3 實藤惠秀《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第40、225頁。

4 關於王治本，可參考拙文《清季東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輯存》，《文獻》2009年10月第4期；《明治時期赴日文人王治本之基礎研究》，吳偉明編《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五、《大河內文書》的特点

筆談資料是近年開始受到學界關注的一種新的文獻，由於其文獻資料跨越數百年，內容林林總總，其文獻特點、學術價值等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李慶教授曾有過比較精準而全面的表述，他認為筆談文獻具有四個特點：內容的廣泛性、表述的簡要性、交流的直接性和存在的單一性。“因為筆談記錄有著如上的一系列特點，所以保存至今的筆談記錄保持了原始性，作為歷史資料可以說彌足珍貴。”¹

《大河內文書》確實也具有內容廣泛性的共性。現存晚清筆談文獻中，“宮島文書”與《大河內文書》堪稱雙璧，但前者多集中在與黎庶昌等駐日外交官的對話，有時抱有刺探情報的目的²，因此，其外交史料價值勝於《大河內文書》，長期以來受到治中日近代史學者的關注，並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³。而《大河內文書》的主事者乃一介被褫奪政治權力、早已被邊緣化的舊藩主。他熱衷於筆談僅僅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用今天的話來說，完全是為了中日友好。明治維新後，日本雖然在政治上與清朝漸行漸遠，但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中國文化的擁躉，大河內輝聲就是其中典型一員。他與中國人過往密邇，熱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甚至愛屋及烏，連小孩、侍從、門房、店員等，不分長幼貴賤饒有興趣地與之對話。他甚至稱僅年長他9歲的何如璋為“慈爺”，自己是匍匐伏拜的“乳兒”（第1937頁）。難怪一直主張中日友好的實藤惠秀，在《大河內文書》付梓前，禁不住在扉頁上寫下了意味深長的一段話：

這是明治時代日本人与中國人不斷進行筆談的珍貴記錄。論文、作詩、問俗、話風流，這是中國崇拜的最後寫照，蘊含著日中友好的諸多問題。

正因如此，“整個‘筆談’，內容五花八門，上至天文地理、人文歷史、博物醫學、古典章句，下至兩

1 李慶《漢文筆談之我見》，王勇主編《東亞的筆談研究》，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15頁。

2 大日方純夫《宮島誠一郎の對外認識と對外活動》，由井正臣編著《幕末維新期の情報活動と政治構想——宮島誠一郎研究》，松戶：梓出版社，2004年；戴東陽《近代中日同盟思想的表與裡——以宮島誠一郎為例》，《史學月刊》2013年第12期。

3 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中華書局，2003年；劉雨珍《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匯編》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戴東陽《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國間的名山大川、風情民物、民間習俗、販夫走卒用語、扇頁的題字和漫畫等几乎無所不包”，“且因彼此關係親密無間，語言上不見什麼客套和外交辭令，十分親昵，身邊的瑣事，特別是涉及男女之私，向為中國士大夫們所諱，但在‘筆談’中却從不掩飾”¹。由此構成了《大河內文書》內容廣泛性的特點。而這廣泛性，如同一座未被開發的富礦，只要去粗取精，由表及裡，就會帶給人們各種研究的收穫。

《大河內文書》除了一般筆談資料的共性外，還具有自己的個性。

一是時間長，頻度高。如前所述，該資料現存8種78卷76冊，上自1875年9月3日《羅源帖》第二卷，下迄1881年10月13日《黍園筆話》第十七卷，共記錄667次筆談（含信函），持續時間6年1個月零3天。當然，僅就筆談時間長度而言，《大河內文書》略遜於宮島文書。供職於修史館的宮島誠一郎（1838—1911），自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始，中經黎庶昌、徐承祖、李經方等歷任駐日使節，一直持續至甲午戰後首任公使裕庚，與中國外交官和文人展開了大量的筆談交流，時間從1878年至1895年，跨越17年²。但是，《大河內文書》的筆談頻度遠勝於宮島文書。如本書第一種《羅源帖》，在1875年9月3日至翌年8月22日約一年時間中，大河內與做客桂林莊的羅雪谷開展了76次筆談交流，其中1875年9月達34次，幾乎每天交流，有時一天數次，早上不過癮，晚上繼續挑燈夜戰。又如《黍園筆話》17卷，大河內與王治本在1年零5個月期間，共進行了241次交流，其中1880年8月達23次，同年6月和11月分別21次。它們宛如錄音機，原生態地記錄下交談內容，又如智能手機，精準地記錄下每天的行蹤。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持續時間長且頻率高是《大河內文書》最顯著的特點。而這一特點自然會衍生其數量龐大、內容廣泛、參加人數多等諸多特點。

二是參加人數多。據統計，在6年的筆談交流中，中日韓共有132人參加（不包含出席，但未參加筆談者），其中中國58人，日本69人³，朝鮮半島5人。

中方參加者主要有首屆駐日外交官和寓日民間文人。前者有何如璋（公使）、張斯桂（副使）、黃遵憲（參贊）、潘任邦（翻譯）、梁殿勳（翻譯）、楊樞（翻譯）、范錫朋（橫濱理事）、劉壽鏗（神戶理事）、沈文熒（隨員，以下同）、廖錫恩、陳衍範、何定求、任敬和等，大多數駐東京的外交官都參與了交流；後者有王氏三兄弟（王治本、王惕齋、王琴仙）、張滋昉、馮雪卿、衛鑄生、周幼梅、羅雪谷等。羅雪

1 王維《“筆談遺稿”的發現與研究價值》，《尋根》2008年第3期，第99、101頁。

2 參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編《宮島誠一郎文書目錄》，1997年，第9—11頁。關於宮島與黎庶昌的筆談記錄，參見拙稿《日藏黎庶昌與宮島誠一郎筆談記錄》，《文獻》2014年11月第6期。

3 大河內輝聲幾乎參與了所有的筆話，故在附錄之中不再列出並索引。

谷爲《羅源帖》主角，畫家，尤其擅長指頭畫，是晚清較早赴日的文人之一，也是明治初期較爲著名的中國畫家之一¹。

此外，不少外交官的親友也參與其中。如何如璋子何其毅、何如璋族叔何虞臣、何如璋侄何定光、何如璋侄何蔬蓀、何其毅家教梁詩五等。還有張子敬家教施積型、黃遵憲弟黃幼達、黃遵憲族弟黃鈞選、沈文熒弟沈蘭生等。更有甚者，使署的侍從何紹文、童僕范升和郎升、門房李奕全和薛耀坤等在大河內輝聲的熱心邀請下亦參與其中。

《大河內文書》所載中國人的記錄具有拾遺補缺的價值。如據《大河內文書》，吳葆仁（靜軒）與大河內有多封來往信件，直接參加了數次筆談（第2486、2490、2499、2500、2504、2549頁），他的身份似乎已經是正式外交官，但他從第四屆公使黎庶昌時代開始，纔正式出現在駐日外交官名單中，自光緒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1890）八月至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他一直擔任使署通事，歷經黎庶昌、李經方和汪鳳藻三屆公使。就是他帶著朝鮮金玉均去上海，然後金在上海被殺，引起了很大的風波²。吳葆仁是否參與了暗殺，爲什麼他一直到黎庶昌第二次出使的時候纔出現在名單中，在這此前到底是什麼身份，吳葆仁身上充滿著諸多謎團。

又如，何如璋次子何其毅、何其毅家教梁詩五、黃遵憲季弟黃幼達，以及黃遵憲族弟黃鈞選³，他們都屢屢參與筆談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日後都成爲外交官，前三人均擔任駐日本使署商務委員，梁詩五還出任長崎正領事官，黃幼達充任神戶兼大阪領事，著有《戊申中日貿易論》等對日經貿調研報告；黃鈞選擔任

1 關於羅雪谷，可參見鶴田武良《來舶畫人研究——羅雪谷と胡鐵梅》（東京文化財研究所企画情報部編《美術研究》第324號，1983年6月）以及川崎智子《曉齋・夏良筆〈東京開化名勝 浅草奥山〉に見える羅雪谷》（河鍋曉齋記念美術館《曉齋・河鍋曉齋研究誌》第110號，2013年3月）等論文。

2 戴東陽《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係》，第295—306頁。

3 黃鈞選還與黃遵憲、王韜等人爲岡千仞的著作撰寫了不少批語（郭真義、鄭海麟編著《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中華書局，2009年）。但他的身份，語焉不詳。黃氏哲嗣認爲：“1880年，因父親思想精進，博曉時事，應廣東大埔縣何如璋（時爲清駐日公使）之聘，往任駐日公使署文案。在日本兩年餘。時值駐日大使黃遵憲編修《日本志》，父親成爲其得力助手，協助完成。”（黃甘英口述，張岱霞、張楠楠整理《客家妹的無悔人生——黃甘英自傳》，群眾出版社，2013年，第13頁）。其他亦有不少學人持此說，如蔣英豪《黃遵憲師友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70頁），筆者也不可免（拙編《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第585頁）。其實根據《大河內文書》，此時黃鈞選是自備弁資赴日。